

## 第十四章 终战诏书

痛恨“忍所难忍……”

1945年8月15日中午，国民从收音机中初次听到了天皇陛下沉痛的声音，这对于任何人也是一生中难以忘记的事情。“那时你在哪里？正在干什么？”这样的提问，在今天仍会激起痛苦的回忆。在国内的日本人，还有太平洋各岛、热带丛林、中国大陆、满洲（中国东北）的荒野、残雪白夜的千岛、遍及整个亚洲的日本人，在这一瞬间，大家象聚在一处似的，彼此抱肩而泣。

天皇读到了“忍所难忍”时，暂时中断了一、二秒钟，却感到时间非常长。然后，继续到：“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诏书全文如下：

### 诏 书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

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飭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軫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哀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御 名 御 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 天皇御旨的再现

迫水久常先生(铃木停战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的回忆说：“终战诏书的原稿，或说是草稿，是我写的。为什么我写呢？因为那是我的任务。”

“一般地称作‘终战诏勅’啦，‘大诏’的啦，其正式的称呼为‘诏书’。传达陛下的御意，有勅旨，诏书、勅书、勅语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根据旧宪法下的公文令，所谓诏书就是‘向国民宣布关于皇室大事和天皇大权施实的圣旨的文书’，天皇签名而且盖上御玺。与皇室大事有关的宫内大臣和总理大臣要在文书上副署名字；与天皇大权有关的总理和各国务大臣副署。但是，实际上诏书是

由宫内省或内阁写成。

停战是依据旧宪法规定的天皇大权而实行的，具体的责任依据宪法第五十五条：‘国务各大臣担负着辅佐天皇的责任’。正因此，所以，向国民宣告停战的诏书也就当然由内阁来完成。比如，天皇召集帝国会议，使众议院解散时也需要诏书，但是，这样的诏书几乎是定形的了，所以由内阁总务课的年轻官员来写也足够了。但是，停战诏书，这一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极为重要的、而且也是最大国家机密的文书的完成，无论如何也不能委托给别人。这是应由总括内阁事务的内阁书记官长亲自做的事情。但是，当时，已不能照常规履行起草文书的手续，就开始亲自起草了。

1945年8月9日，从深夜到10日黎明，在宫中喷泉御苑的地下防空洞，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关于停战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议结束。我回到首相官邸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到二层的书记官长室，马上拿出纸和铅笔，开始起草《终战诏书》。但是，并不能顺利地写下去。当我把话写在纸上时，就觉得因此战争就要结束了，这样写是否可以呢？这使我犹豫不定。我处在一种兴奋状态，拿着铅笔凝视着稿纸，御前会议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按旧宪法，决定国家意志要由内阁的辅佐来进行，天皇只是裁决认可内阁的决定。但是，这个终战的决断就与以往不同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的意见三对三、明显对垒的情况下，就依据陛下的圣断决定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终战’，即陛下御意的发出招致了终战。因此，我在起草《终战诏书》时考虑真实地反映不可改变的御意吧。基于这样的态度，我就想应该起草诏书。

我相当准确地记下了陛下的话，所以，在写诏书时，我首先写下御前会议上陛下的话，把它作为诏书的要点。当然，不用象诏书那样的汉文调，而是如同陛下所讲的口语体。因此，《终战诏书》草稿的第一稿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口语，而且那是完全再现陛下自己的话而成的。

把天皇的话照实写下来，我记得前后不过只用了二、三个小

时。现在还不能忘记的是，再现御言的过程中，眼泪就象决堤的河水吧嗒吧嗒地落在纸上，因为纸不好，所以泪珠一浸，立刻地扩散开来。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文字表现的。现在每当想起停战的时刻，就似乎听到了泪落纸上的声音。”

迫水久常先生继续说：“把陛下的圣言改成诏书体裁时，虽是御言，可必须考虑哪儿绝对要写，哪儿又绝对不能写。作为诏书草案的第一稿，用口语体再现了陛下的御言，把其中应该写的和不应该写的区别开来，然后写成了诏书的形式，那时已是10日天明。这一天，因为下午有重臣会议和阁议，所以，暂时停止了诏书的起草，准备到夜晚再写。可那天夜里，陆军省突然发表了‘吃草也要把圣战进行到底’的陆军大臣布告。因为不知如何处置，哆哆嗦嗦再次拿起铅笔时，已是10日深夜了。记得那一夜稍微打了个盹儿，可11日几乎整天都在起草诏书。

在此之前，每天，每天，都极为忙乱，甚至记不得干了什么，可唯有这一天，是全无政治性活动的‘终战的空白’时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政府根据10日黎明前御前会议后决定，在这天早上向联合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此，联合国将如何表示，那只有等待着回答，当然很紧张。政府在屏息以待联合国的答复。因此，要推敲写成最大国家机密的《终战诏书》，实在是很好的安静的时间。

万事开头难，写文章也是这样。写不出开头，后面就写不下去。诏书第一稿大约用了3个小时写成，但其中的两个小时全用在了这棘手的开头上。不过，倏地想出了这样的句头：‘朕深鉴世界之大势与帝国之现状’可后面又接不上了。想来想去，最后我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写诏书的能力，还是请别人写为好。可以说这是兵马倥偬之际的写作。

我在苦思冥想地搜寻着恰当之词，猛然间在脑中闪出了‘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我自己都觉得极妙的是‘非常之措施’一词，再也没有能把现在日本所处的事态如此简短、恰到好处地

表示出来的词语了。的确是‘非常之措施’，除此外都不能成为宣告终战的用语。我现在还忘不了当时那种轻松的心情。

还有一处麻烦的地方。那就是，今后日本的道路虽艰难，但要忍所难忍走下去。如何表示陛下说这句话时的心情呢？当然这也是今后的日本人要作为日本人而生存的决定性条件。因此，作为鼓励的话，写为‘朕与尔等臣民共在’，但还觉得不足，就在前面加上一词，成了‘朕奉神器与尔等臣民共在。’说到神器，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吧，三种神器是天皇的象征，那不是历代的天皇个人，而是天皇本身，日本国家的象征。因此，特意加进了‘奉神器’一句，但是，在14日的阁议上，轻易地把这一句给删掉了。

——不管怎样，第一稿就这样写成了。但是，反复一读，出现‘朕’字竟有十六处之多。第一稿完成后，一看就心虚了。因此就把内阁嘱托木原通雄君和小川一平君两位叫来，和他们作了商谈。

可是让木原君和小川君看第一稿时，因为有‘相信神州不灭’一句，所以两人就说：‘到了现在这样的时候，相信神州不灭是什么意思啊？’两人是带着非常不满的口气问我的。我说：‘这是首要的，正因为是现在才应该强调：即使战败，日本也绝对不会灭亡。要重振受到打击的国民的情绪，这句话最好不过了。这难道不是一个胸怀祖国的人应树立的信心吗？’但是，尽管我要这样写，但未必我就有了那样的自信。”

最初把《终战诏书》的第一稿打成铅字的女性，就是山本喜代子小姐（原姓田畑），现在听听她的话吧：“记得迫水先生给我最初的原稿是用铅笔写的。书记官长直接交到我手里，没有通过秘书官山下谦治先生。但是，把原稿交给我时，没有什么特别叮嘱。我一读才知道是《终战诏书》，当时我就想：‘啊，应该到来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读完草稿的第一印象就觉得写的比较容易懂，没用那些艰涩难懂的语言，大量使用了日常普通的词语。

11日，迫水书记官长说：“把这个给我打成铅字！就把《终战诏书》的草稿交给了我。我想，终于到来了吗？国民所感受的战争冲击将再也感受不到了。我把初稿打成铅字后，书记官长又作了几次加工。修改后的原稿，用括号标明新加的文字，有的地方就把补充的内容写在另外的纸上，再贴在原稿上。这样反复打了好几遍，我深深感觉到，书记官长为了完成诏书，真正是绞尽脑汁了。”

迫水久常先生说：“虽说是改成汉文调的第一稿，可与最后发表的诏书相比完全不同。即使稍有些汉学知识，因为做了选择，所以使用的汉字很容易，可以说接近于日本文体。”

### 两位汉学者的校订

内山繁(当时为迫水书记官长的秘书官)说：“我和迫水先生是老交情，铃木内阁成立时，因为我是被迫水先生从大藏省拉到内阁来的，所以他常跟我谈一些绝密的话题。而且，因为秘书官室的门与书记官室相连，所以，书记官现在在做什么，我马上就能知道。同时，因为没有进行特别保密，所以，书记官长一开始起草《终战诏书》之事，我就知道了。”

进行这一工作时，书记官最初是与内阁嘱托木原通雄和小川一平两位先生商谈的。‘把木原君给我叫来！’书记官长这样命令我。内阁嘱托并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官邸待命，此时，木原先生正在麻布天现寺的家里，门口挂着‘亚洲经济研究所’字样的牌子；小川先生担任银座战时生活洽谈所的常务理事。去接木原先生的途中遇上了空袭，曾到某处的竹林里躲避。两位先生不在时，迫水先生还曾问过我：‘想这样表示，我的话实在拙笨。你有什么好的措词吗？’‘我用这样的心情来写，你如何理解？’因我对自己的文笔丝毫没有自信，所以就说到：‘再叫别人来好吗？’”

小川一平说：“迫水君和我是高中的同班同学，而总理的长子，

秘书官铃木一君，小学时比我高一年级。似乎因为这样的关系，我算接受了内阁嘱托。其工作是每周星期四的早晨，去官邸和迫水君两人边吃早饭，边这样那样地交谈。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献策之类的问题，不在我职责范围内。迫水君对别人不能讲的话，可以和我说，因此，当时我们的谈话很多。记得12日左右，我和木原先生到了迫水君处，他第一次让我们看了草稿。迫水君说：‘事态终于到了这般地步，你们看一下这个’。我看到的是打印在很粗糙的纸上的文章，因为觉得写得非常好，就说到：“这不是相当的名文吗？”但是，我没有修改文章、特别是《终战诏书》这样重要文章的资格，只是说到，‘是尽善尽美的啊’。至于应如何修改之类的意见，我一句也没说。”

再看迫水的谈话。“《终战诏书》不是那种可以多花几天时间，只要写好了就行的文件，我也被时间所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10日早晨给联合国发去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因此，联合国的回电，早的话可能在11日夜，晚的话在12日就会来到吧。但是，万一回电不能尽如人意，强硬派军人们如果坚决反对终战，推翻陛下的训谕，把国家的方针再次转到战争方面去的话，我所写的诏书草稿，就会成为一页废纸。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无论如何也应让草稿问世。

12日清早，短波广播开始频频传来了联合国的《答复》，围绕着草案的议定和这一回答，政局陷入了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已经没有了慢慢推敲诏书草稿的时间。到了13日，正如所料，军部强硬派坚决不接受联合国的《答复》，而大发雷霆。但是，因为正是天皇决断要下达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转入终战，事态将不可收拾。此时状况非常险恶。

如果停战的话，马上需要诏书。至少在13日里，应该完成诏书全稿，想到此当然很着急。因此，这天夜里，把‘局外人’安冈正笃先生和内阁嘱托汉学者川田瑞穗先生悄悄地请来，请他们对诏书草稿进行最后修饰、校订。

安冈先生不仅是卓越的汉学者，而且通过金鸡学院这样的结社、私塾等组织，从事着国粹思想的普及工作。按我的想法，即使我国失败了，全体国民也应继续具备带有日本特性的东西，即日本精神。所以，要把那样的精神融入诏书，安冈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请先生看诏书草稿并作修改再好不过了。

还有一位川田先生，他作为受内阁嘱托，从事于这种文件的写作也是其本职工作，因此，诏书的校阅还需要他经手。据我的记忆，当时安冈先生没有头衔，是位在野学者，因我的独自决定，让这样的人看国家的机密文书，而且承蒙他来完成的紊乱纲纪，我是以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个人的名义请他来的。但是，在要请两位先生来几小时前，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第三者发表的意见。

确切地说是13日下午。诏书草稿在让两位汉学先生看之前，我又将诏书重新读了一遍。正在读时，大东亚次官田尻爱义突然进入了书记官长室。因为我和他是亲友，所以象对木原、小川君那样也想和他商量。‘你觉得这个怎么样？’说着，就把诏书草稿递给他了。可是田尻君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到：‘真难懂啊，再写得通俗些怎么样？’”

听听纯属偶然为《终战诏书》进言的田尻爱义讲述吧：“迫水先生说是13日下午，记得我去官邸时是11日。11日的话，诏书草稿还几乎没有完成。我之所以说是11日，因为，11日黎明有了圣断，因此，今后政府的动向和事态将会如何呢？我想要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所以我就从大东亚省（现在美国大使馆的第二别馆）的旧满铁大楼遛达着步行去了总理官邸。当时的确是下午2点。我进入书记官长室时，只有迫水先生和木原通雄君在，他们两人在说着什么。因为彼此是亲密的朋友，所以我也坐下来听他们谈话。

记得迫水先生向我谈了政府的种种情报。当时，有一位事务官进来，也许因为我在吧，他犹豫着不肯说话。迫水先生问道：‘什么事？’答道：‘那件东西誊写完了’。迫水先生又说：‘正好，读读看’，事务官也许因为见不认识的我在那儿，还是踌躇着。‘读



吧，这位是大东亚省的次官，读呀?!’迫水先生这样一说，他终于读了起来，那就是《终战诏书》。迫水先生问我：‘怎么样?’我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不怎么样’。于是，迫水先生对那位事务官说到：‘把它放在那，你去吧。’又面问我问到：‘哪儿不行，为什么?’我不赞同的地方，有多处，首先是诏书的最后，‘维护国体——向世界进军’中的‘国体的维护’。已经到了新的时代却还讲带有古老味道的国体总觉得可笑。捍卫国体的时代不是早已逝去了吗?现在再说那种话不是太晚了吗?我国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因为国体才迎来战败的吗?

我们国家在1935年，围绕美浓部达吉博士(宪法学者。原东大名誉教授)的‘天皇机关说’，及由此派生的‘国体明征’问题(1935年3月23日，众议院通过了《国体明征决议案》)，国家舆论经历了很大的混乱。于是，以此为契机，军部开始了战争的狂奔，结果导致了今天的战败，现在就要拿出战败的诏书了。所以，在诏书中应该讲到在‘失败’的事实面前，将来如何是好?应该怎样做等方面的问题。诏书中不仅没提这些问题，反而讲维护古老的国体——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于是，迫水先生解释道：‘实际上，在修改诏书的过程中已经明确了，如不把维护国体，即天皇制的存续写入诏书，恐怕军队中会发生叛乱。无论如何也应该把这样的文字写进去。’我又分辩道：‘但是，在诏书中好好地写着朕与尔等臣民共在，就是说，天皇今后也要与国民一同再建国家，这样不就足够了吗。’‘这无论如何也要写进去，你别说了。’迫水拒绝了我的意见。坦率地说，我对迫水先生还讲道，期望天皇担负起战争责任退位，皇室财产也应向国民公开之类的话，因为我们当时都在苦思冥想。

但是，迫水先生，当然，连在场的木原君也说道：‘那种事毫无道理’，根本不予理睬。可是，不管怎么说，继续讨论吧。我和迫水先生谈。木原君听着，一想出好的名文句，我们三个人就展开文稿，挽袖提笔，直言不讳地讨论一番。不管怎样，因为要继

续下面的话题，我就提出了妥协方案。‘所谓国体，具体说来就是皇室的万世一系，也就是肇国的神勅，但最重要的关键不就是君臣一体吗？那就是国体的精华。如果换成这些文字的话我可以妥协’。迫水先生终于同意了。他说：‘那么，就那样写吧。’国体的维护两字去掉，改成了‘精华’。

说到国体，我还主张按现在的潮流，应该写出向前看的诏书。在新思想和旧想法之间不能存有断层，能否很好地弥合其间的裂缝是今后的一大问题。因此，我强烈希望，使《终战诏书》成为新旧之间的第一架桥梁。纯属偶然，在迫水先生写诏书时，我能从旁提出看法，并如此坦诚地谈了意见。”

### 难解的“五内如焚”

田尻爱义氏继续说：“是终战，还是和平？两种主张处于紧张阶段后，陆海军的军人带着军刀的咔嚓声常来我这里。因为他们把东乡茂德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看作是和平派的魁首，就来施加压力。他们说：‘田尻先生，请想想，以前发出干！干！这样的号令，现在接受《波茨坦公告》，就会冷不防地命令停止！那样的话，国民如何做好呢？今后的日本民族将会怎么样呢？如果对方要进攻本土，为何不战到最后呢？如果战到弹尽粮绝的地步投降的话，我们日本民族一定会产生重新崛起的决心。可是，如此中途停战国民会不明白如何是好。当然，如接受《波茨坦公告》，也许皇室会平安无事，可那已不是皇室的问题，而是民族的问题。因此，不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你是次官，请你把这些话好好地向大臣进言。’对此，我回答说：‘是否唯有本土决战才是使民族精神延续的唯一道路呢？我觉得似乎还有另外的道路。你们说即使本土受到彻底性破坏也可以，如果真的受到更大的破坏，果真还存在崛起的希望吗？破坏也必须是有限度的，你们应从这一方面重新考虑。然后我再向大臣传达你们的意思’。现在说来，那只是一般的讨论，

可当时彼此真是流着泪说那些话的。正因如此，我也认真考虑过，如果接受《波茨坦公告》，终止战争，出示《终战诏书》的话，怎样使用语词？如何告知国民呢？问题之一就是国体，还有一个是民主政体问题。因此，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想出包含那种意思的文字。

木原君等绞尽脑汁想出了‘笃守道义’、‘不致落后于世界之发展’这两句，就是说既要重视道义，又不能落后于世界的进步。这是要最大限度地说出当时对民主政体态度的用语。现在想来，再怎么说也是含混的，可是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限度的表示了。当然，我并不以此为满足。如果是诏书的话，因为有形式和传统的束缚，那样说是不得已的。

看看总理就诏书写作的训话吧：‘要更为简明地把民主政体，这一今后日本所应走的道路写进去。我写要点，文章由木原君写。’总理回到官邸，写好要点，交给木原君时叮嘱道：‘怎样把这运用到文章中就是内阁的事了。’由此可以看出总理的训话连一点儿天皇‘担负责任退位’那样的意思也没有，只是‘诚惶诚恐’，怕使天皇决断受到牵连。

还有一处我接触过的地方。因为在迫水先生写的诏书草稿中，没有一句对东南亚各国的‘终战的慰问’，所以我就请求将此话写入。进行战争的不只是日本人，东南亚的人们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战争。要把此种意思写入诏书，作为管辖范围是外务省的事，可担负着行政占领职责的是大东亚省，所以，我想我这样说也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我说过：‘不管怎样，我们是在解放东亚的口号下，把亚洲的人们拉进这场战争的，这场战争的主人日本要投降的话，不是应该对他们表示歉意吗？’对此，迫水先生也说：‘那么，就全如你所说的了。’于是，诏书中有了‘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共同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一句，我长期从事与中国有关系的工作，1944年，在村田省藏大使的领导下，担任驻菲律宾公使。想来，的确日本在战争中到处制造独立国，进行着所

谓的‘东亚的解放’，可是从我自身的体会而言，独立，也只是起着把不愿与日本一同战斗的新兴独立国家勉强拉入战争行列的‘安抚作用’。

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迫水先生让我看的诏书草稿，我冒失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可是，最后我觉得不能使人一目了然的原因，在于诏书的文体形式。如此重要的诏书应该用人们一听就容易懂的文体。因此问道：‘干脆改成口语体怎么样？’迫水先生答道：‘那要在阁议上商量后才可以，不过，实在无力写成口语体了’。

从当时迫水先生的语气看，与维护国体问题不同，没有一开始就否决我的提议。现在我还认为，从当时他的情绪看是赞成我的提议的。当时，他说过：‘你说的有道理，可我没有信心阁议能通过’。木原君说‘不会通过的啊’，就没把它当作一回儿事。因此，我又一次厚着脸皮提出了妥协方案：‘那样的话，至少不查字典就不会看懂的难字就不要使用了’。迫水先生说‘那我赞成，使用的汉字只限于那些一听就懂而且是无法用别的词代替的汉字。但是，在听诏书广播时其中有一句‘五内如焚’，一点也不懂。在我们经手的诏书草稿中，当然没有这样难懂的句子，记得是在天皇广播二、三天后，唯有那一句怎么也不明白，就问迫水先生，那是什么意思啊？他给我解释说：‘五内就是五个内脏，如焚就是悲愤如火烧胸的意思。’我说：‘那样的话，为什么不如此写呢？’就是这个问题我弄不明白。

记得从11日下午2点左右开始，有几个人出入总理官邸，那天，官邸比往日平静，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再待到起身告辞时，我和迫水先生、木原君不约而同地说道：‘喂，天亮了啊！’与平常同样的夏日的太阳正在东方的天空中升起，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们再看看田尻也不会想到的那句“五内如焚”的修正部分吧。那是因为后来两位汉学者参加了诏书的定稿。《终战诏书》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

## “义命”和“时运”的差异

“在我的诏书草稿中，接受大东亚次官田尻爱义君的重要建议不是11日，我记得似乎还是13日。不过，因为重在内容，日期是某一方记错了，所以就这样吧。”

再看迫水的谈话：“田尻君回去后，为做最后的润饰，我把两位汉学先生川田瑞穗和安冈正笃叫到了官邸。实际上，这天（13日）夜里，东乡外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的三人会谈正在总理官邸悄悄地进行着。在这次会谈中，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了陆海军要作抵抗或提出四项条件的意见，结果都被东乡外相拒绝了。

回到诏书的话题上，我请两位汉学先生是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后，时间已相当晚，都11点多了。事前也没和两先生联系，突然派使者‘请来’。川田先生当时住在澁谷，因他受内阁嘱托，即使突然来叫，他也会想到是有工作吧，可是安冈先生完全是在野人士，我想他一定会吃惊的。安冈先生先到达官邸，等两人都到后，我告诉他们这是机密事项，请他们看看诏书草稿，从专家的角度加以修正。

这时，我担心的是川田先生。川田先生是内阁嘱托，可安冈先生没有头衔，而且从年龄来看，川田先生年长，与安冈先生同席而座，我想川田先生会不痛快的。可他是位温厚的人，内心虽有不满，也不让别人觉察。关于我的诏书草稿，他也只说了一句‘可以’。安冈先生用锐利的目光一直看着文稿，他用惯有的平和的语气，指着第四段最后的‘期望确保永久的和平’一句，说道：‘我想起中国北宋大学者张横渠（名载）的著名格言与此相为适合。立天地之心，建养民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请照原样使用这一句话。’说完，他给我写在了另一张纸上。

在御前会议上接受陛下决心时我就感到，陛下念念不忘的是

把今后的日本再建成一个永久和平的国家，因此，我觉得那句话非常合适，就按照他的建议当场改成了‘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于是安冈先生又指着第四段中间的“——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忧思断肠”一句，更正说：‘忧思断肠’一词，表示一种私情的心绪，如男女别离，与妻子分别奔赴战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是那样，在公众场合不能使用。这里用‘五内如焚’为好。这就是田尻君说的难以理解的典型例子。安冈先生一说，我想确实如此。安冈先生又指出了‘五内如焚’稍后边的一句‘忍其难忍’，这也是后来在国民中最有感染力的地方。我的原稿是‘朕忍所难忍’，安冈先生说，在‘朕’和‘忍所难忍’中间还是加上合适的词为好，于是他改为：‘朕义命之所存忍其难忍’。当时先生解释说：‘我们现在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了，结束战争如果因为战败不得已才停止，那么国家的再建就没有把握。结束战争就我国的情况，是大义、道义的至上命令，即义命使然，应该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这样就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一句。我深为佩服，真不愧是汉学家啊。但是，这一部分在内阁会议上又被改成了‘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到了战后，我因此还受到了安冈先生狠狠的责备，说‘义命之所存’和‘时运之所趋’，意思大大不同，‘义命之所存’就如同前面解释的那样，而讲‘时运之所趋’可以说成‘听任时代之变迁’了。我没能阻止阁议对诏书的修改，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两者意思会有那么大的差异，这是我的失败，我应道歉。”

### 在阁议上的删改

关于诏书草稿的修改，迫水说“请直接问安冈先生”。安冈正笃谈到：“诏敕这类文件，如被宣布后，就成了陛下的御言，所以草稿的起草人没有理由说三道四。因此，关于此事，以前我没在公开场合讲过。只是，有多多少少的误传，所以曾跟家里人解释过。

各位如想了解关于所修改部分的实际情况，希望不要从我的口中。而从我的亲人口中得知。”所以，下面我们转而听听他的“亲人”的解释吧：“首先是‘义命’一词。在诏书中，陛下要说‘忍其难忍’。这里，必须有相应的作为天子的重要的话语，因此，我选了‘义命’一词。它出自中国的古典著作《春秋左氏传》（一般简称《左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传说是战国时左丘明所作。《春秋》出自鲁国史官之手，孔子作了加工，是叙述长达242年的鲁国历史的史书。鲁国是在公元前249年灭亡的国家）中的成公八年：‘以信行义、以义成命。’这句话比一般所说的大义名分，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就是说，是道义的至上命令。《左传》是一个例子，我在脑中搜寻着以前读的古典著作，那句话在我脑中突然闪现出来的，我想‘为万世’比‘永久的和平’在语气上更为强烈。无论如何，我认为，《终战诏书》的要点在于‘义命’和‘为万世’两点。我们为什么要结束战争，其意义必须明确。我当然觉得那种意义就包含在这两句话中，如果有人问我哪个轻哪个重，那我会说两个都不可缺少。如硬要逼我说的话，可以说重点在‘义命之所存’因此，我曾恳切地叮嘱过迫水先生：无论有什么理由和障碍，这两个要点绝对不能删掉。可是，在阁议上却把‘义命之所存’改成了‘时运之所趋’。

在还不清楚诏书形成过程的后世学者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恐怕高见之人往往会断定：所谓‘时运之所趋’，是某种低级的想法吧。这种见解实在难以接受。‘时运之所趋’的意思就是听凭事态的发展，任凭风吹所向，怎么样都行，没有见识。因为听凭事态的发展而停战，这违反天皇道的本义。根据‘义命’这种良心的至上命令，无论时运怎样，也要这样做，这样才能确立天皇的威信。战后，忘了是什么时间，我也参加了由终战时的大部分阁僚举行的聚会。因为话题偶尔涉及到了诏书，我就这一点作了严肃的评论。之后决定，关于诏书的一切话题，即使请我，我也不说了。”

再把话题转向最终决定诏书案的14日那次阁议。这次内阁会

议也是正式决定停战的阁议，在此，我们只谈谈诏书部分。

迫水先生说：“在这次阁议上提出的诏书案，与13日完成的相比，稍有差异，在阁议即将开始时，我还有几处要加写进诏书中。那是因为我打算把第一次御前会议上陛下的讲话和心情，忠实地融汇进诏书草稿中，可在14日上午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陛下又说了以前没讲过的话，因此我想也应把这加进去。陛下新的讲话内容是：‘今后，要把日本再建成和平的国家，我想这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另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如果国民齐心协力，一致努力，一定能建成。我也与国民共同努力。’我懂得了陛下非常迫切的心情，陛下与我们一同流下了泪水，因此，这样的心情必须体现在诏书中。

陛下的这一心情，如果按我的解释大概是，国民的任务重大，举国都要努力。因此，我从皇宫回来后，在阁僚们一起吃饭的过程中，我想出了‘任重而道远’和‘举国一家’两句，要把它写入诏书的最后一段。一般人会说，这是‘举国一致’的笔误吧？可是，这里不是‘一致’，无论如何也应是‘一家’，意思就是国民要完全象一个家庭的成员那样同心协力。陛下说‘与国民共同努力’时，我非常高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产生了‘我们的陛下’这种感觉。对当时陛下的这种考虑本身，人们就不胜感激了。他说到要与国民共同努力时，就更向国民这一方靠近了。

按我的记忆，把那些写进诏书草稿后，又一次请安冈正笃先生来看，他说可以后，我马上请打字员田畑君（山本喜代子小姐）打成铅字，又让内阁官房总务课印刷。为在阁僚审议时能加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留了很大空隙，这样，一篇诏书的印刷品用了两页粗纹白纸。不管怎样，从中午御前会议结束，到下午2点左右开始审议诏书，就是做这些准备工作。当然不只是诏书草案，还有此间停战的政府决定需要印刷。记得当时忙得头晕目眩。”

再说那次内阁会议。铃木停战内阁的阁僚，包括总理共十六人。先听听铃木一先生（铃木贯太郎总理的长子、总理秘书官、后



为日本马术联盟会长)的话：“原则上，即使是总理秘书官，也不能出席阁议，可因为父亲的右耳不好使，在‘助听器’的意义上，特意给了我父亲身后的一个席位。实际上，在铃木内阁产生的第一次阁议上，作为‘阁议决定第一号’，就承认我可以出席阁议。在我的记忆中，诏书副本不是用铁笔刻的板，而是把打印品印在两页粗纹白纸上的，我见过几次。诏书草案是由迫水君写成的。当时，我曾问过父亲，诏书案内容如何？于是，父亲对我说：‘所谓诏书，就是把陛下的御言如实地改成汉文调的东西。如果原原本本地写出了陛下的圣意，就是优秀的诏书。迫水君很好地领会了陛下的心意，担负起了起草工作。’阁议上对诏书的审议相当费时间，其间，陆军大臣阿南先生和海军大臣米内先生几次中途退席，特别是阿南先生成了主和派与不肯停战的陆军强硬派之间的夹板，因为他非常担心，所以就常常离席以应付陆军内部时时的举动。我这样猜测着，同时也很同情阿南先生，他每出去一次，我们就增强一份紧张感。因此，最先给诏书草案补加句子的也是阿南先生，那就是加在第二段中间的‘战势日非’一句。这句话表明了陆军的不服，相当固执地坚持己见。”

### 顽硬的阿南陆相

铃木先生说：“阿南先生出生于大分县，他用流利的东京口音，明快而又顽强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顽强这方面，外相东乡也是位同样的人物。他给人的感觉是真正的顽强，可阿南先生的顽强与外相具有不同的格调。响应阿南先生这一主张的，是海军大臣米内先生。米内先生这个人本是沉默寡言之人，也许是因为东北口音的缘故，不大发言。可当阿南先生说‘陆军决不会失败’时，他突然说出一句‘实际上是失败了吗？’，即使如此，会议上对此还是争论不休，结果，米内先生让步，把‘战势日非’改成了‘战局未能好转？在我的印象中，记得这一部分花的时间最长——”。

太田耕造先生(铃木停战内阁的文相,后为亚细亚大学校长)说:“记得送到我们阁僚手中的诏书文稿是油印品,读一遍,再读一遍,因为觉得很好,所以,我希望修改的字句一处也没有。成为问题的地方就是‘战势日非’一句,阿南陆相希望修改,我很清楚作为陆军首领的阿南先生,当时所处的境地,强烈感到了他那痛苦的心情。因为这个问题花去了很长时间,我自己也没有要改的地方,所以中途退席,回到文部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然决定了终战,就应该传达给省内,同时,因为还有马上要做的工作,所以就回去作了指示。返回官邸时,记得审议已结束,后面只要国务大臣副署就可以了。”

也看看安倍源基先生(铃木停战内阁的内相,后为新日本协议会代表理事)的谈话:“那句‘战局未能好转’的修改,我理解这是阿南先生作为陆相要完成其最后的任务,这件事现在还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最初看诏书草稿时,觉得词语表达有点难懂,因为宣告终战是件大事,还是再稍微简明一些为好。可想来,历代诏敕都是那种格调,这样也就可以了。只是‘义命之所存’一句怎么也难以理解,因为阁僚中的长辈也就此作了发言,所以我就想自己是晚辈,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迫水先生的谈话:“修正的‘战局未能好转’是阿南先生想出的句子,这大概花了一个小时左右吧。接着,作为问题讨论的是‘义命之所存’一句。一般人没曾听过这句话,因为不懂,就说‘要修正’我忘了是谁,不,似乎是阁僚中的大多数都这样要求。我遵照安冈正笃先生的指教,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打算极力维持原样,可是怎么也得不到大家的同意。最后,有人说:‘书记官长,给我把辞典拿来,’我拿来了备在官邸的极普通的《汉和辞典》,查了也没找到。要是出自《左传》的话,当然一般的辞典不会有。于是,有人就追问我‘《汉和辞典》上也没有,国民会明白吗?’

因为‘战局未能好转’一句的修改已花去了很长时间,在此又争论不休,所以时间很快过去了。因为着急,最后我打消了原来

的念头，提议：‘那么这句就删掉吧’。但是，有位阁僚说：‘不，这个地方还是有句话为好。’因此，就在辞典上找来找去。在查的过程中，我记得是安井藤治国务大臣发言说：‘时运之所趋’这句成语怎么样。大家都说‘可以，可以’，于是，就把它加了进去。我对不起安冈先生，可那次阁议怎么也不能同意‘义命’的提法。如此，仅这个问题，就讨论了约30分钟……”

安井藤治(铃木停战内阁的国务相。陆军中将)说：“看了两遍诏书文稿，因为有几处不理解，我也作了发言，可没记得我指出‘义命’一词。‘五内如焚’和‘义命’，在阁议上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这是事实，因为语言表达过于难懂，不好理解意思。或者说，有阁僚问到是否有那样的成语，书记官长就作了解释，可是最后去掉‘义命’，改成了‘时运’。记得‘五内’一句并没怎么讨论，就照原文那样了。我发言指出的是‘炸弹’和‘陈谢’两句……”

围绕“义命”的争论，我们听听铃木先生的记忆：“我没记得那么清楚。迫水君说那句话好，是因为他向安冈先生请教了那句话的意思而深深地记下的缘故吧。在阁议上说这个地方不明白的不是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先生和阿南先生。为弄明意思让拿来辞典的可能是下村先生。因为下村先生说辞典上也没有，迫水君就向他解释了‘义命’的大致意思。没那么争论不休，就是说，不象‘战局’一句那样争执不下，似乎记得比较顺利地决定了。到后来才知道，是我们没有学问——”

迫水先生说：“接着，提出异议的是最后一段的‘朕——常奉神器’部分，这是石黑忠笃农相指出的。他说：‘听说在美国的普通大众当中，也有人在考虑我们的天皇是否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因此，在诏书上那样写，他们就会认为，天皇神秘力量的源泉在神器上，因此美军在日本登陆后，也许会就神器进行搜寻。那样的话，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没必要特意表示出来。’其他阁僚也赞成，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删去了。

所说的三种神器，即八咫镜、天丛剑、八极琼曲玉，是皇位

的象征，亦是天皇本身。说得简单些，就是不把天皇个人，而把具有三种神器的人称之为天皇。因此，对于皇室来说，三种神器是难以替代的宝物，是神圣的存在。因此，在我看来，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能否‘维护国体’，维护国体只要有天皇在就不担心了。因此，‘朕——奉神器’作了这样强烈的表示。但是，如刚才所说，因石黑农相的发言删去了这句话。可阿南陆相说：‘我们关于国体维护没有得到对方（联合国）的确认。因为这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可靠的方法确认国体了。’我答到：‘唉呀，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办法了。’他还是主张‘那样的话，我们单方面宣布维护国体吧。’如果，‘奉神器’可以说是间接的维护国体的宣言，那么，阿南先生当然想直接表示出维护国体之意。关于这种间接表示与直接表示的好坏对比，我一再向陆相解释，但仍无法理解不肯罢休的阿南先生的心情，就决定把那种意思重新写入诏书。那么，加在哪里呢？正好，删掉了‘奉神器’，便在此处加维护国体。于是，当场写出‘得以维护国体’一句，经阁议一致通过。

另外，关于第三段中间原子弹的表示，因为安井国务相的提议，把原稿中的‘暴虐的武器’，改成了‘残酷的炸弹’，而且，还把第四段开头一句——朕对诸盟邦表示道歉中的‘道歉’，改成了‘遗憾’。

结束诏书的审定是14日下午8点左右。实际上，审议结束前，内阁总务课的佐野小门太先生在另外一间房子里，用毛笔誊写了诏书原稿，它现在还保存在内阁官房总务课。”